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机制*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发现

郭晓欣 钟世虎 李子健

【摘要】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和扩展回归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差异化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和定居可能性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而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建立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内嵌于本地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强。文章聚焦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关联,研究结果对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差异化社会网络 农村流动人口 城市居留意愿 个体社会资本 城市身份认同

【作者】郭晓欣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世虎(通讯作者)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李子健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上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582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3%。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通过“结构红利”效应提升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都阳等,2014),不仅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已加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工体系,但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2&ZD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王春光,2006),大多处于“工作在城市、生活回家乡”的半城市化状态,难以平等充分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等社会权益。这些现实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讨论(罗楚亮、董永良,2020),也不断推动着国家政策改革^①,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②。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近年来流动人口实现完全城市化的制度门槛逐步降低。但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难点,不仅在于打破原有的制度壁垒,更重要的是破除因长期城乡隔离导致的社会文化障碍,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认同障碍。有研究指出,与市民权相关的社会事实一方面取决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成员心理层面的感受息息相关(陈映芳,2005)。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在流入地城市实现真正的市民化,需要获取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与城市身份认同。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的社会网络,特别是本地社会网络,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当地获取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李树苗等,2006,2007;悦中山等,2011)。因此,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社会网络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中,部分文献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及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李树苗等,2006,2007;杨菊华,2009;悦中山等,2011),也有文献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社会网络对个体特征及行为(王玉君,2013)、工作和收入状况的影响(Chen等,2018)。这些研究为理解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提供了经验依据,不过,现有研究很少系统考察社会网络的性质及其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本文从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交往关系出发,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量化评估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预计居留时长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通过区分社会网络类型,对比分析了本地社会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网络这一非正式资源视角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丰富了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其二,本文识别了本地、乡土和外地三种类型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影响,检验了社会网络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两大机制,即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有助于为完善流动人口政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①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14/content_573206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流动人口的城乡迁移决策和居留选择

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有助于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人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与便捷,并为城市建设增添动力。目前,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问题的研究已相当丰富。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量学者在收益—成本的框架下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经典的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一步从“推—拉”两个角度阐明了农村人口城乡流动的决策机制。已有研究一般认为,农村人口选择流向城市、小城镇人口流向大城市的原因在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平均工资更高(潘丽群等,2020)、工作机会更多(余运江、高向东,2017)、公共服务相对优质、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Au等,2006)。

在传统理论框架下,既有文献主要从个体特征或城市特征出发,探讨个人预期收入增长(陈杰等,2021)、生活成本差异(周颖刚等,2019)、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汪润泉,2016)、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及性(林李月等,2019)、城市规模(孙中伟,2015)等因素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与定居选择的影响。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以中国的户籍制度为背景,探讨身份认同(陈映芳,2005)、收入不平等(常进雄等,2016)、社会分层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融入的阻碍作用。这些研究特别关注了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半城市化”现象,即未能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融合的现象(王春光,2006)。熊易寒(2012)从微观层面诠释了“半城市化”现象,认为城市将城乡流动者当作劳动力生产要素或消费者,而非当地公民;农村流动人口仅在经济上被城市吸纳,但在社会情感等其他方面被排斥。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仅要在流入地实现经济适应,更要形成城市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以最终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二) 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城乡居留意愿

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社会网络是农村流动人口实现真正城市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网络的主要功能是信息、物质等资源的交换,“交换”是群体或个体之间社会网络搭建的基础(Blau,2017)。社会交换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人们往往拥有不同质的社会资本,通过交换别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弥补自己的不足,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目标。社会资本的提出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集合体,人们能够获得的资源多少取决于其拥有的制度化或私人认可的关系网络大小(Bourdieu等,1986)。詹姆斯·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决定人们能否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詹姆斯·S·科尔曼,1999)。科尔曼认为,在复杂的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个人不仅可以从这些关系网络中获

取物质资源,还可以在网络中形成相互关心、相互信赖的心理情感资源,进而对个人实现既定目标产生正向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是依靠社会网络关系的延伸来实现的,根本在于社会资本背后的资源在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发生转移(边燕杰,2004)。因此,建立社会网络关系会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嵌入获得社会团体成员的身份,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与决策(Christoforou,2013)。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可分为“信息”和“影响”两种类型,前者指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如工作渠道、就业机会、工资歧视等),后者指社会网络所包含或者能够动用的资源或权力,从中直接获得切实的帮助(Granovetter,1973;陈杰等,2022)。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社会网络,特别是“后致”资源型的本地社会网络,有可能显著提升其社会资本(李树茁等,2006,2007;悦中山等,2011),强化其在流入地城市的经济适应,进而增强城市居留意愿。在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市民化尚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这一机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尤为关键。

此外,城市心理融入是农村流动人口真正城市化的重要保障,城市身份认同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悦中山等,2011)。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由“农转非”“居民户口统一登记”等制度性途径获得城市户口,实现市民身份转换和认同;另一类是在流动过程中,伴随城市居住和工作经历产生的对市民身份的主观认同(盛亦男,2017)。一般而言,城市身份认同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自我身份认同,即在交往过程中农村流动人口认同自己作为流入地城市一员的身份;二是他人身份认同,即农村流动人口在交往过程中感知到的外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网络的建立,除了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本地化社会资本支持,也会在交往过程中培育群体间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的情感性资本(Bannister等,2013),拉近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心理距离,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崔岩,2012)。当农村流动人口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时,其主观上认为自身在城市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或者情感依托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小,对城市产生较强的依恋和归属感,进而增强其城市居留意愿。因此,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有助于促进其城市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提升城市居留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以15岁以上、在本地居住超过1个月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具备覆盖面广、样本量大等特点。数据中包含了个体层面较为详细的信息,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学术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陈杰等,2022;周颖刚等,2019)。除微观调查数据外,本文还使用了全国各地级市

的社会经济特征信息,相应数据来自 2017 年城市统计年鉴。

(二) 识别策略与变量说明

本文聚焦于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网络建立与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系,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定量评估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二,识别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差异性影响。

1. 基准模型

由于城市居留意愿是二分类变量,本文首先构建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text{Probit}(\text{settled}=1) = \alpha + \beta_1 \text{SocialN} + \beta_2 \text{Control} + \beta_3 \text{Region} + \varepsilon \quad (1)$$

在式(1)中,*settled*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本文使用“未来一段时间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来测量。该变量是分类变量,0 表示不打算留在本地,1 表示打算留在本地,另有部分流动人口选择 2“没想好”。由于“没想好”对应的样本居留意愿无法准确识别,在基准回归中暂时不考虑。*SocialN*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网络建立”。本文参考李树茁等(2007)、悦中山等(2011)的研究,将其界定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的人际关系,依托于非工作原因的密切或频繁来往,使用“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以及其他亲属)”来收集信息。该题项中“业余时间”强调了非工作原因的来往,“来往最多”强调密切或频繁的来往。本文将回答“很少与人交往”界定为在流入地城市没有建立社会网络,赋值为 0;将回答“与在本地的同乡、本地人和在本地的外地人交往”界定为在流入地城市建立了社会网络,赋值为 1。*Control* 表示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其他因素,根据已有研究,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流动人口个体和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本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长、流动距离、是否在本地购房、是否在户籍地有宅基地、行业类型、流入—流出地的收入比^①(陈杰等,2021;周颖刚等,2019;汪润泉,2016);二是流入地城市的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为省会或一线城市、人均 GDP、人口规模、落户门槛(孙中伟,2015;李亭亭等,2021;陈杰等,2022)。其中,城市落户门槛使用张吉鹏和卢冲(2019)测算的各地级市的落户门槛指数来度量。该指数基于 251 个城市的大约 1 000 份户籍政策文件数据库,运用投影寻踪模型从投资、购房、人才引进、普通就业等维度量化测量了 120 个代表性城市的落户门槛。*Region* 是所在区域的虚拟变量向量,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 ε 是随机扰动项, α 为常数

^① “流入—流出地收入比”使用流入地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与户籍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测量。

项, β_1 、 β_2 、 β_3 为待估计系数。本文重点关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 β_1 。

2. 稳健性检验

上述 Probit 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来源有:一是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建立可能与其城市居留意愿互为因果,即想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当地建立社会网络;二是基准回归中忽略“没想好”的群体可能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调查数据显示,相应样本(占总样本的 14.89%)的人力资本特征与总样本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低学历占比更高,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比例更低,业余时间与本地人接触最多的比例明显更低、很少与人来往的比例则显著更高;三是模型中可能存在与解释变量相关的未观测遗漏变量,比如社会网络的建立往往与个人能力和性格等因素相关,而个人能力强、性格外向的流动者也更有可能选择在本地居留。为降低上述内生性问题可能产生的估计偏差,本文采用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 ERM)进行检验(罗明忠、刘子玉, 2022)^①。

此外,尽管已有研究大多使用“未来一段时间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或者“打算留多久”测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和定居意愿(刘涛等, 2019;周颖刚等, 2019;盛亦男, 2017),但这一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完全反映以务工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的真正居留意愿。因此,本文通过改变对“没想好”样本的处理方式,以及使用户口迁移意愿替代居留意愿进行稳健性分析。

3. 机制分析

在使用 Probit 模型和 ERM 模型定量评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网络建立对居留意愿影响的基础上,本文从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两方面验证其影响机制。首先就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信息”型社会资本和“影响”型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分别构建模型,探究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其中,信息型社会资本使用被访者的月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来测度,该变量为定序变量,选项“减少”、“不变”和“增加”依次赋值为 1、2 和 3。影响型社会资本使用被访者在流入地参与有影响力的组织的情况测量,将参加了工会、家乡商会、老乡会、同学会、志愿者协会等组织活动的赋值为 1,没有参加赋值为 0。结合这些变量的测量特征,机制检验的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text{Oprobit}(income) = \alpha + \beta_1 \text{SocialN} + \beta_2 \text{Control} + \beta_3 \text{Region} + \varepsilon \quad (2)$$

$$\text{Probit}(Organization) = \alpha + \beta_1 \text{SocialN} + \beta_2 \text{Control} + \beta_3 \text{Region}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income$ 表示“信息型社会资本”, $Organization$ 为“影响型社会资本”;其他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式与式(1)一致。

^① 扩展回归模型可同时处理内生变量、内生样本选择、处理指派、随机效应或多种情形组合的内生性问题。

然后,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身份认同的影响,以检验社会网络建立通过城市身份认同的强化机制对被访者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将“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中,成为其中一员”(本地身份获取意愿)和“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本地身份感知)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代理变量,将“我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歧视感知)和“我觉得本地人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平等感知)作为“他人身份认同”的代理变量。

4. 拓展分析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预计居留时长和永久居留意愿是全面认识流动人口城市化问题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进一步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在流入地预计居留时长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text{Oprobit}(P_{\text{settled}}) = \alpha + \beta_1 \text{SocialN} + \beta_2 \text{Control} + \beta_3 \text{Region} + \varepsilon \quad (4)$$

式(4)中, P_{settled} 表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预计居留时长”,采用定序测量,1~5的数值依次代表预计在城市居留1~2年、3~5年、6~10年、10年以上和定居。

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与不同群体建立的社会网络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进而对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本文将业余时间“是否与本地人来往最多”“是否与本地同乡来往最多”“是否与本地的外地人来往最多”分别定义为“本地社会网络(LocalN)”“乡土社会网络(VernacularN)”“外地社会网络(FieldN)”,构建 Probit 模型探讨不同性质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异质性。除核心解释变量调整外,模型设置与式(1)基准模型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三) 分析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受访者的年龄均值为35.73岁;婚姻状况以在婚为主,初婚和再婚的比例合计达83.4%;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比超过2/3。一半以上的被访者本次流动为跨省流动,流动时长均值为6.383年;多数被访者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超过60%。户籍地有宅基地的被访者比例超过75%,但在流入地城市购房的比例较低,仅为18.6%。分析样本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超过50%;省会或一线城市的占比在63%左右。这些城市的人均GDP较高,均值超过10万元;人口规模均值约575万人;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均值为1.009,分布差异较大。就流动者的居留意愿而言,明确打算留在本地的被访者占比为83.1%,超过55%的人具有长期居留意愿(居留10年以上或定居)。接近八成的被访者在流入地城市建立了社会网络。

四、社会网络建立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

(一) 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基准模型评估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首先使用 Probit 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 量	均值	变 量	均值(标准差)
居留意愿(1=打算留在本地,0=其他)	0.831	年龄	35.734(9.611)
预计居留时长		性别(1=女,0=男)	0.420
1~2年	0.123	婚姻状况(1=在婚,0=不在婚)	0.834
3~5年	0.232	受教育程度	
6~10年	0.085	初中及以下	0.683
10年以上	0.151	高中/中专	0.206
定居	0.409	大专及以上学历	0.111
户口迁移意愿(1=愿意,0=不愿意)	0.475	本次流动时长(年)	6.383(6.053)
社会网络建立(1=有,0=没有)	0.792	本地身份获取意愿[1,4]	3.281(0.635)
流动距离		本地身份感知[1,4]	2.846(0.766)
市内跨县	0.174	歧视感知[1,4]	1.976(0.732)
省内跨市	0.315	平等感知[1,4]	3.205(0.625)
跨省	0.511	信息型社会资本	
城市等级(1=省会/一线城市;0=其他)	0.630	收入减少	0.313
行业类型		收入不变	0.527
第一产业	0.026	收入增加	0.160
第二产业	0.369	影响型社会资本(1=有;0=无)	0.413
第三产业	0.605	本地是否购房(1=是,0=否)	0.186
所在地区		户籍地有无宅基地(1=有;0=无)	0.760
中部地区	0.169	流入—流出地收入比	6.227 (2.415)
西部地区	0.246	城市人均GDP(万元)	10.003 (2.916)
东部地区	0.518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575.575 (563.433)
东北地区	0.067	城市落户门槛	1.009 (0.607)

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仅控制被访者个人层面的特征,模型2同时控制个人及城市层面特征。结果一致显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建立社会网络有助于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真正城市化。

除关键解释变量的效应外,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在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巿居留意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形下,已婚、流动时间较长、受教育程度较高、较年轻的流动者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更强。这一结果印证了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年龄优势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决策的重要性。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在流入地购房作为一种在城市安定生活的保障会显著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巿居留意愿(刘金凤、魏后凯,2021);与之相反,在户籍地拥有宅基地、流动距离相对较远的流动者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显著更低,反映了乡土保障和乡情牵绊对城市化的反向

作用(刘涛等,2019;丁悦等,2021)。流入地与户籍地收入差距越大,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谋求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潜在激励越强,其城市居留意愿会显著提高,这与潘丽群等(2020)、余运江和高向东(2017)等的研究发现一致。

(二)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再评估

上述分析结果初步显示,在流入地建立社会网络会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为排除可能的反向因果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ERM模型对相应效应进行再评估。选取“首次流动前父母是否有流动经历”(以下简称为“父母流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主要在两方面与内生变量相关:其一,父母在流动经历中建立社会网络的技能和经验会传递给子代,父母善于社交的被访者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时可能更加活跃;其二,父母在流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网络及内嵌的社会资本可能会转移给子代。本文参考 Miguel 等(2004)的做法,主要通过排他性约束讨论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先找出“父母流动经历”这一工具变量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定居决策的可能渠道,然后将“社会网络建立”以外的影响渠道逐一排除或控制。借鉴盛亦男(2017)的研究发现,父母流动经历可能主要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影响子代的城市居留意愿。社会资本主要依托于社会网络而存在,是本文关注的主要渠道,因此,需要重

表 2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 Probit 模型拟合结果

居留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网络建立(参照组:无)	0.148***	(0.024)	0.174***	(0.030)
年龄(岁)	-0.014***	(0.001)	-0.013***	(0.002)
女性(参照组:男性)	-0.039*	(0.022)	-0.060**	(0.027)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0.146***	(0.029)	0.167***	(0.037)
大专及以上	0.165***	(0.040)	0.148***	(0.048)
在婚(参照组:不在婚)	0.347***	(0.031)	0.341***	(0.038)
本次流动时长(年)	0.019***	(0.002)	0.021***	(0.003)
流动距离(参照组:市内跨县)				
省内跨市	-0.043	(0.034)	-0.081	(0.054)
跨省	-0.150***	(0.033)	-0.270***	(0.055)
在本地购房(参照组:无)	0.288***	(0.036)	0.379***	(0.049)
户籍地有宅基地(参照组:无)	-0.071***	(0.027)	-0.031	(0.034)
流入一流出地收入比	0.020***	(0.005)	0.018**	(0.007)
行业类型(参照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0.099	(0.086)	0.092	(0.105)
第三产业	-0.066	(0.085)	0.121	(0.103)
所在地区(参照组: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0.182***	(0.070)
西部地区			-0.160**	(0.068)
东部地区			-0.128*	(0.068)
省会/一线城市(参照组:否)			-0.017	(0.034)
城市人均 GDP			0.000	(0.000)
城市人口规模			-0.000	(0.000)
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0.059	(0.040)
截距	1.926***	(0.109)	1.857***	(0.151)
样本量	59217		41669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点考察由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渠道引致的违反排他性约束的情形。

第一,父母流动经历可能会增强父母关于文化资本的认知,从而更加关注并尽可能提升子代的受教育程度,由此影响其子代的城市居留意愿。本文取子代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代理变量,考察父母流动经历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流动经历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①。为控制这一渠道的影响,分析中将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第二,父母流动经历可能会改善家庭经济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子代的城市居留意愿。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积累难以直接度量,以房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具有较强的代际传承性影响,本文选取“是否在流入地城市购房”作为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经济资本的代理变量。通常来说,农村流动人口很难通过自己的收入在城市购房,特别是在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现实背景下尤为如此。因而,农村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城市购房”部分反映出其家庭的经济资本积累状况。本文考察了父母流动经历对农村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城市购房”的影响,发现相应影响并不显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检验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排除父母流动经历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但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以外,其他渠道的作用预期较小。本文借鉴 Conley 等(2012)的做法,构建回归模型验证了工具变量的近似外生性。

表3展示了使用ERM模型、拓展样本(包括“没想好”)和更换结果变量(使用户口迁移意愿)后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矫正内生性问题后,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依旧显著。估计结果也显示,工具变量(父母流动经历)与被访者的社会网络建立显著相关。模型4将表示“没想好”的被访者纳入分析样本(明确打算留在城市赋值为1,没想好和不打算赋值为0),检验社会网络建立对被访者明确打算留在城市的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结果依然稳健。模型5使用户口迁移意愿替代居留意愿,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

表3 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的回归结果

	模型3(扩展回归)		模型4	模型5
	居留意愿	选择方程 (居留意愿)	第一阶段回归 (考虑“没想好”)	(户口迁移意愿)
社会网络建立	1.652**(0.830)		0.181*** (0.016)	0.095*** (0.017)
父母流动经历		0.085*** (0.011)	0.012*** (0.002)	
样本量	46674	46674	48774	36084

注:表中所有模型均控制了个人及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下同。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未展示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作者索取。

人口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网络建立对个人城市化的促进效应。

2. 农村流动人口的预计居留时长和永久居留可能性

表 4 进一步使用流动人口的预计居留时长为结果变量,通过拟合有序 Probit 模型和 ERM 模型检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时长和永久居留可能性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在流入地的预计居留时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未建立社会网络者,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社会网络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预计居留时长更长,选择定居的可能性也更大。使用 ERM 模型拟合的结果印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为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城市化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

(三) 社会网络建立影响城市居留意愿的机制检验

1. 社会资本积累途径

按照理论分析,社会网络建立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积累影响其居留意愿。为检验相应效应,本文对“信息”型社会资本(工资收入变化)和“影响”型社会资本(参与有影响力组织的可能性)分别拟合有序 Probit 和 Probit 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建立显著提高了农村流动人口收入增加的概率,也提高了其参加有影响力组织活动的可能性。这些结果印证了社会网络建立对流动者社会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通过提升其在流入地的经济适应和社会融

表 4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在城市永久居留可能性的影响

	有序 Probit 模型	扩展回归模型(N=36039)	
	(N=29608) 预计居留时长	选择方程 (预计居留时长)	第一阶段回归 (社会网络建立)
社会网络建立	0.053*** (0.029)	1.017** (0.422)	
父母流动经历		0.088*** (0.012)	0.015*** (0.003)
切点 1	-2.480*** (0.295)		
切点 2	-0.852*** (0.295)		
切点 3	-0.387 (0.295)		
切点 4	0.402 (0.294)		

表 5 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信息型、影响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信息型社会资本 (N=47659)	居留意愿 (N=40747)	影响型社会资本 (N=48774)	居留意愿 (N=40747)
社会网络建立	0.082*** (0.013)		0.614*** (0.015)	
信息型社会资本(参照组:不变)				
增加		0.085** (0.039)		
减少		-0.155*** (0.030)		
影响型社会资本				0.131*** (0.029)

注:表中所有模型控制了个人及城市层次的控制变量,囿于篇幅未展示,截距和切点估计结果也未展示。

人,从而显著增强其城市居留意愿。

2. 城市身份认同途径

社会网络建立还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为检验相应影响机制,本文针对被访流动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身份认同变量分别拟合有序 Probit 模型,表 6 展示了相应结果。由表 6 可见,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身份获取意愿、本地身份感知、平等感知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农村流动人口歧视感知的影响显著为负。除歧视感知效应为负外,上述各变量对被访者的城市居留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些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建立会显著强化流动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身份认同,由此促进其在流入地城市的心理融入,进而强化其城市居留意愿。

表 6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建立对自我及他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本地身份获取意愿	本地身份感知	歧视感知	平等感知	居留意愿
	(N=48774)				(N=41669)
社会网络建立	0.172***(0.022)	0.172***(0.021)	-0.178***(0.022)	0.183***(0.023)	
本地身份获取意愿					0.474***(0.020)
本地身份感知					0.314***(0.021)
歧视感知					-0.158***(0.018)
平等感知					0.319***(0.018)

注:同表 5。

(四) 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1. 本地社会网络建立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探讨本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7 中模型 6 和 7 的回归结果一致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8 采用 ERM 模型矫正内生性问题、模型 9 使用户口迁移意愿作为居留意愿的替代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这表明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

表 7 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居留意愿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扩展回归)		模型 9	
	(Probit)	(Probit)	居留意愿	选择模型 (居留意愿)	第一阶段 (本地社会网络)	户口迁移意愿
	居留意愿	居留意愿				
本地社会网络建立	0.140*** (0.026)	0.145*** (0.035)	2.435*** (0.007)	0.086*** (0.011)	0.003*** (0.001)	0.183*** (0.017)
父母流动经历						
样本量	59217	41669	46528	46528	46528	36084

注:模型 6 控制了个人层次控制变量;模型 7 至模型 9 控制了个人及城市层次的控制变量。

2. 乡土社会网络建立

表 8 展示了乡土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 10 至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乡土社会网络建立对其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模型 13 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乡土社会网络建立对其户口迁移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农村流动人口的乡土社会网络不仅不会增强其城市居留意愿,反而会削弱其户籍迁移意愿。根据前文理论探讨可知,这可能是由于乡土社会网络可能会引发彼此的思乡情绪,进而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

表 8 农村流动人口的乡土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居留意愿	模型 10 (Probit)	模型 11 (Probit)	模型 12(扩展回归)		模型 13 户口迁移意愿
			居留意愿	选择模型 (居留意愿) 第一阶段 (乡土社会网络)	
乡土社会网络建立	0.015 (0.022)	0.030 (0.028)	-1.016 (1.530)		-0.043*** (0.014)
父母流动经历				0.085*** (0.011)	0.007** (0.003)
样本量	59217	41669	46117	46117	46117

注:模型 10 控制了个人层次控制变量;模型 11 至模型 13 控制了个人及城市层次的控制变量。

3. 外地社会网络建立

表 9 报告了外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 14 至模型 16 的回归结果一致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17 显示,外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外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不会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相反会抑制其户籍迁移意向。这可能是由于外地社会网络可能增加彼此对不稳定打工生活的感同身受,进而抑制其城市化进程。

表 9 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居留意愿	模型 14 (Probit)	模型 15 (Probit)	模型 16(扩展回归)		模型 17 户口迁移意愿
			居留意愿	选择模型 (居留意愿) 第一阶段 (外地社会网络)	
外地社会网络建立	0.001 (0.034)	0.025 (0.041)	-1.119 (2.163)		-0.049** (0.021)
父母流动经历				0.086*** (0.011)	0.006*** (0.002)
样本量	59217	41669	46239	46239	46239

注:模型 14 控制了个人层次控制变量;模型 15 至模型 17 控制了个人及城市层次的控制变量。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社会网络纳入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研究中,并尝试构建了“差异化社会网络建立→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城市居留意愿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网络建立会显著提升其城市居留意愿,其作用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和城市身份认同强化。一方面,社会网络建立会通过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的“信息”型社会资本和“影响”型社会资本,强化其在流入地城市的经济适应,进而增强其城市居留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建立会通过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关于其城市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感知,推动其城市心理融入,进而增强其城市居留意愿。此外,本研究也发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加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预计居留时长,提升其在流入地城市定居的可能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社会网络建立在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本研究区分了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建立的社会网络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本地社会网络的建立会显著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而乡土社会网络和外地社会网络建立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城市本地人建立社会网络更容易使流动人口在城市积累社会资本和强化城市身份认同,从而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相比之下,与流入地城市的老乡或外地人建立社会网络,一方面其内嵌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功能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相应社会网络有可能增加流动人口的思乡情绪或对彼此不稳定打工生活的感同身受,进而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要支持鼓励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建立其社会网络,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为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与本地居民的联系和交融创造更多的机会,以提升其城市居留意愿和永久居留的可能性,助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二,要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体系,对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流动人口避免形成“物理”上的隔离,创造条件使其在流入地城市享受居民的基本待遇,同时避免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或歧视,引导本地居民对农村流动人口建立平等的观念,为这两部分群体的交流和交融创造空间和时间,以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城市身份认同,进而深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第三,在流动人口数量过多的城市,加快建立和推进同常住人口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扩大资源总量的同时,优化资源分配,让流动人口更好地共享城市化的发展成果,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2. 常进雄、赵海涛(2016):《所有制性质对农村户籍劳动力与城镇户籍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
3. 陈杰等(2022):《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学术月刊》,第7期。
4. 陈杰等(2021):《户籍歧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5. 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6. 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7. 丁悦等(2021):《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地理科学进展》,第11期。
8. 都阳等(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第8期。
9. 李树苗等(2006):《中国农民工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0. 李树苗等(2007):《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
11. 李亭亭等(2021):《流动人口居留时长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地理学报》,第12期。
12. 林李月等(2019):《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地理学报》,第4期。
13. 刘金凤、魏后凯(2021):《城市高房价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财贸经济》,第2期。
14. 刘涛等(2019):《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5. 罗楚亮、董永良(2020):《城乡融合与城市化的水平与结构》,《经济学动态》,第11期。
16. 罗明忠、刘子玉(2022):《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17. 潘丽群等(2020):《城市规模工资溢价视角下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经济学动态》,第9期。
18. 盛亦男(2017):《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居留意愿的代际影响与机制研究》,《人口研究》,第2期。
19. 孙中伟(2015):《农民工大城市定居偏好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20. 汪润泉(2016):《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第3期。
21. 王春光(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22. 王春光(2009):《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学习与探索》,第5期。
23. 王玉君(2013):《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24. 熊易寒(2012):《“半城市化”对中国乡村民主的挑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25. 杨菊华(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
26. 余运江、高向东(2017):《市场潜能与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2期。
27. 悦中山等(2011):《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社会》,第6期。

28. [美]詹姆斯·S·科尔曼著,邓方译(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9. 张莉等(2017):《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第8期。
30. 张吉鹏、卢冲(2019):《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经济学(季刊)》,第4期。
31. 周颖刚等(2019):《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经济研究》,第9期。
32. Au C., Henderson J.V.(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3):549-576.
33. Bannister J., Kearns A.(2013), The Function and Foundations of Urban Tolerance: Encountering and Engaging with Difference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50(13):2700-2717.
34. Blau P.(2017),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Routledge.
35. Bourdieu P.(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36. Chen Y., Wang L., Zhang M.(2018), Informal Search, 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 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1(3):837-876.
37. Christoforou A.(2013), On the Ident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ocial Capital of Ident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4):719-736.
38. Conley T.G., Hansen C.B., Rossi P.E.(2012), Plausibly Exogenou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260-272.
39. Granovetter M.S.(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1360-1380.
40. Miguel E., Satyanath S., Sergenti E.(2004),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4):725-753.

Determinants of Rural Migrants'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Guo Xiaoxin Zhong Shihu Li Zijian

Abstract: Using data of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2017, this study fits a probit model and an 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ted social network establishments of rural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on their decision to sta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network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to stay and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nd it identifies that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urban identity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mechanism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social network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rural migrants' intention to stay, while neither the vernacular social networks nor the field social networks show significant effects, which highlights the strong func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urban identity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network. Focusing on the root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semi-urbaniza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type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Keywords: Differentiated Social Networks; Rural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Urban Identity

(责任编辑:牛建林)